

Zhanqian Huabei Fengyunlu

战前华北 风云录

任常毅 蔡德金 编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战前华北风云录

任常毅 蔡德金 编译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室

前言

本书根据日本松本重治先生回忆录《上海时代》（日本中央公论社发行）一书编译而成。

松本重治生于1899年。1932年12月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一直任职到1939年，在中国充当记者达7年之久。

松本重治到上海赴任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并进一步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国华北之时。从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起，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我国华北，在军事上以武力相威胁，在经济上步步侵入，政治上威胁利诱，迫使中国政府相继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造成了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局面。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以此为起点，兴起了全国范围的抗日新高潮。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虽然对日本逐渐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但是并未根本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外仍企图继续与日本妥协，对内依然推行反共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共”政策，内战于是停止，从而为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抗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1937年7月7日，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时，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终于爆发。

在此期间，松本重治作为一名记者及日本联合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不仅与中国政府的许多要人有着许多接触，而且也与华北日军将领及在华的日本外交官保持着广泛和密切的联系，因此获知了许多内幕新闻。为了及时报导各方新闻，松本在

到任不久，不顾中国政府的规定，非法建立起无线电发射台，直接向其总社发报。1933年至1937年期间，围绕着华北危机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发生的许多事件，松本都及时作了报道。

松本的回忆录《上海时代》，就是回忆他在这一时期的采访生活。他对各项事件的评述，都是以当年的消息报道为依据的。他在书中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抗战前中日关系、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各派的关系，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当然，由于作者本人所处时代、本人世界观及思想方法有一定局限性，故在对一些问题的议论上难免失之偏颇，乃至有不正确的地方。在叙述当时情况时，难免有夸大本人作用之处。这些地方，望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松本的原著涉及面很广，我们所编译的主要是有关华北形势的部分。

本书由本溪大学任常毅、北京师范大学蔡德金二位同志编译。由于水平所限，错误与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1年3月15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赴上海	(1)
上海太平洋会议.....	(1)
加入联合通讯社.....	(4)
采访活动的三原则.....	(6)
上海赴任.....	(7)
安装非法无线电台.....	(9)
接连输给对手.....	(11)
第二章 中国的知友	(14)
同叶楚伦的会见.....	(14)
与中国朋友交往.....	(18)
日中经济考察团.....	(20)
浙江财阀的巨头们.....	(23)
第三章 东北、华北之行	(25)
初次见到的东北与华北.....	(25)
何廉教授的友情.....	(28)
第四章 蒋汪合作政权	(31)
汪兆铭其人.....	(31)
蒋汪合作政权的出现.....	(34)
汪的辞职通电.....	(35)
第五章 日使有吉的对华交涉	(37)
有吉明其人及“天羽声明”.....	(37)

水鸟外交.....	(41)
藏本事件.....	(43)
通车通邮问题的解决.....	(45)
日中关系正常化的趋势.....	(47)
广田外相演说的反响.....	(49)
汪、蒋分别与有吉会谈.....	(52)
唐有士与高宗武.....	(54)
蒋介石会见日本记者.....	(56)
第六章 国民政府的亲日外交	(58)
王宠惠访日.....	(58)
汪兆铭的亲日演说.....	(62)
对日亲善的经济背景.....	(64)
对日新政策与日本的反应.....	(67)
梅津——何应钦协定.....	(68)
第七章 日本二元化的对华外交	(70)
有吉大使递交国书.....	(70)
初次会见汪兆铭.....	(72)
土肥原、秦德纯协定.....	(74)
“《闲话皇帝》”事件.....	(75)
汪的辞职和蒋的挽留.....	(78)
第八章 广田三原则	(81)
华北事变后日中外交的再开展.....	(81)
蒋大使提出中国三原则.....	(83)
三大臣对华政策谅解事项.....	(86)
对广田三原则的抵抗.....	(88)
汪兆铭遇刺.....	(90)
第九章 “华北自治”工作	(92)
币制改革与李滋罗斯.....	(92)
华北问题的核心.....	(95)

滦州事件与国民政府的低姿态·····	(96)
在华军人的反击·····	(99)
有吉与蒋介石的重要会见·····	(103)
有吉大使给外务省的报告·····	(105)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107)
有吉终于离去·····	(110)
第十章 1936年的局面 ·····	(112)
亲日派总动员的国民政府·····	(112)
日本记者对华北形势的报道·····	(114)
华北的实力人物们·····	(115)
矶谷武官同蒋介石的会见·····	(118)
有田、张群连日会谈·····	(119)
增兵华北的反响·····	(125)
川越大使到任与《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	(126)
第十一章 难于进展的外交谈判 ·····	(131)
二中全会的对日方针·····	(131)
须磨、张群的预备会谈·····	(133)
谈判中断·····	(136)
会谈中断后的中国动向·····	(143)
亚洲局长奉命赴华与中国报界的反响·····	(145)
蒋介石与川越大使的会见·····	(146)
第十二章 高涨的抗日运动 ·····	(151)
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论·····	(151)
从杭州、西安、太原会议到洛阳会议·····	(155)
绥远事件·····	(160)
救国会七领袖的被捕·····	(163)
川越、张群会谈的结束·····	(165)
第十三章 西安事变 ·····	(168)
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最后阶段·····	(168)

125242

第一章 赴上海

上海太平洋会议

初次踏上中国上海的土地，是在1927年8月上旬，由欧洲回国途中，我所乘坐的热田丸在上海停泊两天的时候。当时，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为之欢呼的国民们，家家户户、大大小小的商店，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我虽然深深感到中国在发生变化，但真正熟悉上海的风俗民情，并能多少洞察出一些中国的形势，那是在四年以后，即1931年10月至11月间，我作为日本代表在上海出席第四次太平洋会议之时。

1929年在京都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应中国代表的要求，决定下次会议于二年以后，在中国风光明媚的杭州举行。中国代表提出此项要求的目的，是由于日本在中国东三省的活动，引起日中关系日渐恶化，希望借此唤起各国对中国的关心和同情。但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日军飞机轰炸锦州，中国迅速掀起了反日浪潮。面对如此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国代表提出了两项强硬主张：第一，第四次太平洋会议无限期延期；第二，不准日本代表参加。第一项主张带有抗议性质；第二项主张则比抗议更进一步。

太平洋会议中央理事长杰罗姆·格林得知中国方面的要求后，深感会议有不能如期举行的危险，即于10月初赶往上海，试图说服中国方面。尽管格林费尽心机，但中国方面仍坚决反对举

行正式会议，只同意格林提出的召开中央理事会及国际调查和计划这两个委员会（包括日方理事、委员参加）的折衷方案。

日本方面积极设法召开太平洋国际调查委员会，立即接受了格林的折衷方案，并派出新渡户理事及前田委员等人前往上海。我也随日本代表团飞抵上海。

10月12日，格林在上海设晚宴招待各国理事。会上，他提议将会议地点由杭州改为上海，并表示为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不称该会为正式会议。但各国理事认为，既然各国理事及代表都已到达上海，不如仍举行正式会议，结果以决议形式通过举行正式会议。21日第四次太平洋会议在上海正式召开。会议由格林主持，中国代表徐新六致简单欢迎词，日本理事新渡户代表各国来宾致答词。

会议虽然如期召开，但实际上有着种种困难。最大的难题是，是否把满洲问题列入议事日程。计划委员会在讨论此事时，该会委员长卡特根据中国方面的意向，将此问题提交会议讨论决定。但日本委员鹤见则表示坚决反对，称满洲问题在一年前的计划委员会的决议中并未列入议程，而且如果讨论政府间正在交涉的政治问题，那么太平洋关系调查会的性质，就有由学术会议性质变为政治会议性质的危险。英国委员奥诺拉·柯蒂斯则提出了折衷方案，在表示赞成日本委员提议的同时，主张“对满洲的政治性事实，理解应从学术立场来研究”。这样，满洲问题虽然未作议题提出，但对日本关东军军事行动的议论，则在会议的发言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会议讨论的议题共有9个，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中国的外交关系或在太平洋的和平机构这两点。

我对这次会议的感受很多。有人认为，中日两国代表能同时出席会议，仅此一点，也是莫大的成功。此外，也有人相信，把会议变成帝国主义者的集会，是解决太平洋问题的唯一方法。固然，由于会议性质的限制，不可能有多大作为，但使各国委员对

有关中国和满洲问题受到不少启发。对于日本内情，无论其长处或短处，皆增加了了解。关于中国外交关系的讨论，与四年前的京都会议相比，在内容上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间的政治抗争状态，在会议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上海会议上，我结识了两位朋友，一个是团长徐新六，另一个是胡适。徐新六出生于浙江杭州，早年在格拉斯哥和巴黎留学六年。曾在北京大学执教，后投身财界，当时是浙江财阀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①见识也高，为人也诚实。徐先生当时42岁，与70岁的新渡户团长相比，是相当年轻的团长。从他身上可窥见年轻中国人的面貌。我时时注意观察他的言行，渐渐地对他尊敬起来。他是我在上海时期结交的几位知己中，一位可以真正信赖的友人。胡适出席上海会议时，刚满40岁。他在会上作了“为了中国的进步，必须引进西欧文化”的讲演，从他的根本思想即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对中国思想史作了深刻的反思。当时还未使用“近代化”这个词。他笑颜常开，但说话很稳重。徐新六虽然担任中方团长，但会议的主席却是胡适，这可能是由于互相尊重的缘故吧。我在上海时，胡适每次从北京^①来上海，便来同我交换如何实现中日和平等问题的意见，我们总是很坦率地谈论各自的看法。

在中国代表团中，还有一个人给我印象很深，他叫丁文江。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1934年他辞去北大教授职务，担任了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与声誉很高的翁文灏齐名，是中国最有名的两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讲演中，一边出示地图和统计图表，一边强调说明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讲演相当雄辩有力。原定翁文灏也出席（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但没有来。前年，伦敦大学的理查得·托阿内伊教授受托为上海会议准备文件时，曾来中国旅行调查工农业生产情况。他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下同。

在调查报告中说，丁文江与翁文灏两人都是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而且都是地质学家。他认为何廉的近代经济学虽然很有价值，但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还没有真正培育出来。

另一位学者就上海的租界问题做了非常认真的发言。他是专攻国际法的夏晋麟教授。他出生于浙江省，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学位后回国，在上海商学院当教授。在上海的花园桥附近的公园里曾竖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夏教授就此事以租界问题为题，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以国际法为依据做了发言，论述的重点是要求恢复新兴独立国家的主权。他以其冷静的论述，对英美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其真挚的态度，得到了多数人的共鸣。与此相反，日本代表信夫淳平却以中国的现实为由，反对夏教授的主张，对租界问题主张渐进主义。

加入联合通讯社

会议结束，我便从上海回国。不久，联合通讯社的常务理事岩永裕吉先生邀我参加他的联合通讯社，并让我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的社长。他说：“现在上海成了排日的中心地，外务省及海军方面都对此深感棘手，日本新闻记者向报社打电报，说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也难与和第三国的人对话，以与中国的排日言论相对抗。我仔细了解过你在京都召开的那次太平洋会议上的言行，又从前田多门君那里打听了你这次在上海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上的工作情况，因此想拜托你往上海，进行这项工作。我不要求你这一两天就答复，但请好好考虑一下。”

现在看来，这一天我与岩永先生的谈话，实际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我在7月初到轻井泽万平旅馆拜访了在那里疗养的岩永先生，说明我已下决心去上海。岩永先生坦诚地说道：“说实在的，联合通讯社财政困难，说不定就要倒闭。在这种情况下，待遇是不会好的。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邀请，与我一起工作，好

吗？”我明确表示没问题。岩永先生非常高兴。就这样，加入联合通讯社的事便全决定下来了。我从排日的美国，再到排日的中国，不禁使我感到自己受到料想不到的命运的安排。

按照与岩永先生的约定，我于12月从东京出发。出发前，我曾两次到联合通讯社去请示和商谈有关工作事宜。总经理古野先生对我说：“关于你的工作，已从岩永先生那里听说了。想请你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但同时也请你担任记者协会的常务理事。”我对记者协会一事很惊诧，立即向古野先生问道：“记者协会是做什么的？”古野先生回答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时常和中国人及第三国的记者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就可以了。”他一边让我心情平静下来，一面又扼要地把记者协会由于没有恰当的常务理事，使有关方面感到为难的情况，向我作了说明。

事情是这样的：1932年1月上海“一·二八”事变的时候，中国方面进行了激烈地反日宣传。但日本方面误报和捏造事实的报道很多，因此深感准确发布新闻的必要。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海军和陆军的情报人员，以日本俱乐部为中心，在日本侨民，其中大多数是一些大公司的经理等的协助下，建立了名为“记者协会”的英文新闻发布机构。上海事变结束后，随着事态的平静，记者协会的活动也暂时停止了。可是华北的形势日益险恶，中国的反日情绪及抗日宣传，愈来愈高涨。为此，海军和大使馆方面首先提出恢复记者协会的活动，他们特地与岩永先生及古野两位先生商谈此事，并选拔合适人员来主持其事。结果，他们的主张得到岩永和古野两位先生的支持，决定加强和扩大联合通讯社的英文部，并以“RENGO”作为电头。至于主持人，则以新任联合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兼任记者协会的常务理事，编辑主任则由联合通讯社（以下简称“联合”）的英文部长松尾先生兼任。经古野这样一说，我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我说：“我不想为政府和军方从事宣传工作。因此，不是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兼上海分社社长，而是上海分社社长兼常务理事，

把‘联合’的英文服务作为记者协会的中心，必须将两件事明确下来，我才能接受。”我的要求得到古野的同意。我们一共谈了两个小时。临走时我又向他提出要求说：“在我赴任前，作为记者和分社社长，我还要来请教。”古野先生答应了我的要求。

采访活动的三原则

两三天以后，我再次与古野先生见面。我诚挚地向古野先生请教采访之道。他告诉我，拍发电报的工作已任命老练的奥宫正澄君为发报部长，请我不必过于担心。之后，又向我介绍采访经验说：“采访时，首先要掌握的是给与取。在同采访对象会见时，万万不可表示要获知什么新闻等急迫之状，相反，首先要告诉对方可能想知的消息。做到这一点，需要平时很好地学习。比如，在上海的日本人一定想知道东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对此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就可以讲给对方听。还有，你在采访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人时所听到的新闻，也要先向对方提供。这样做，不管你什么时候去找人家，被访者都会觉得你是个能说有趣消息的人，在交谈中，对方就会‘老实说……’从而告诉给你消息。‘因为是你，我才说的哟’，接着，就会向你道出秘密。只要你懂得‘给与取’的道理，把握好两者间的关系，工作干起来之后，保准成功。这种做法，在采访中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时，也保准奏效。”我一字不漏地记住了古野的这一席话。

“还有第二条”。古野先生继续说下去，“对于报社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信用。特别是与消息渠道及记者间的信赖关系。如果对方说‘别写！’那么你无论如何（假定为拍电讯）也不能拍电发稿的，一旦失去了信任，就不可能再进行采访了。如果这是非拍不可的消息时，可从另一消息渠道采访同一消息。这样做，则不致辜负第一消息渠道的信赖。但是，原则上说，信用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被视为‘守口如瓶’或‘信用可靠’的人，以后人家

就会主动地向你提供各种消息。”古野先生的话完全符合人们的心理，令我非常佩服。

我又向古野先生提出了类似外行者的问题：“如何采访到独家新闻？”古野先生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所谓独家新闻，有一半是靠运气。有时，事件发生了，你偶然在场；有时，是长时期建立起的新闻渠道迅速通知你。但采访的秘诀，在于创造条件，开辟新闻渠道，这是第三个要点。如果你能创造这个条件，就总会有独家新闻。如果你终于能与很难会面的人物单独会见，这便是创造条件、提供新闻的简单办法。其他的办法可能更复杂一些，如果由你布置使日本要人与中国或第三国要人会见，这也是创造条件提供独家新闻的机会，这条新闻也自然成了你的特别快讯了。目前对于你来说，这也许有点难，但很快就会得心应手了。我说的这三点，也称为采访三原则，如果你努力去做，必定成功无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三原则牢记在心，认真实行。当天分别时，古野先生严肃地对我说：“你虽然是公子哥，可决不许奢侈！现在，在上海分社的汽车等交通工具，一定要处理掉，要步行上班！”

上 海 赴 任

1932年12月12日，我由东京动身去长崎，庄原君与我同行。当日送行的除高本先生、古野先生、福冈君之外，还有在中央大学上夜大的学生30余人。夜大的学生对老师很讲情谊，在这一点上，私立大学的学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当时，在车站里，学生们突然对我们高喊“万岁！”这在我一生中是唯一的一次，尽管我并不明白何为“万岁”。

我们在长崎住了一夜，第二天便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大概是由于出发前过于劳累，上船之后便患了感冒，大汗淋漓，庄原君一直用毛巾为我擦拭额上的汗水。幸好只卧床一天，便渐渐恢复了健康。

当船通过吴淞口，抵达上海杨树浦码头时，上海分社的奥宫君、松尾君，还有无线电技师吉田松治君等都到码头迎接。我与他们都是初次见面。之后，他们为我和庄原君在北四川路的“新雅”广东饭店举办了欢迎宴会。愉快地见面，使我感到同他们定会合作成功。

上海联合分社，是在外滩南端往西拐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英语名为Avenue Edward VII），大北电信公司（Great northern Cable Co.）大厦的四楼。四楼由路透社全部借用，有14间屋子，而“联合”又从路透社借了一间屋子。

我们依次到与工作上有关系的各处，进行了到任后的首次拜访。首先是大使馆情报部、总领事、海军武官室、陆军武官室，然后是《朝日新闻》（以下简称《朝日》——译者）和《每日新闻》（以下简称《每日》——译者）的分社、《上海每日新闻》、《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等处。在两、三天时间里，一一拜访完毕。

当时，上海大使馆情报部长是须磨弥吉郎，总领事是石射猪太郎，海军武官是佐滕脩大佐，陆军武官是田代皖一郎大佐。此外，在海军担负特别任务的是冈野大佐。特别是情报部长须磨与冈野大佐，他们两个人作为记者协会的专务理事，衷心欢迎我这个兼职理事到任。《每日》分社社长是吉冈文六；《朝日》分社社长是木下猛，他到任稍晚；《上海每日新闻》社长是深町作次；《上海日报》社长是波多博。当时报社同人都认为我当记者毫无经验，我来上海不是为采访新闻，而可能是来和外国人一起吃吃饭而已。但我作为“联合”的分社长，一开始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做好新闻报道工作。我规定早上8点上班，晚饭后再去一趟分社。几天后，各报社分社长以及通讯社长在一起聚餐时，“电通”社分社长神子岛梧郎君对我说：“我刚到任时，也曾试着晚上也干，可是身体坚持不了。松本君恐怕也不能坚持半年。”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如果每日都这样紧张，恐怕不能持久。于是，没有

特别要干的事情，晚饭后就不去上班了。但是，为保持与总社在事务上的紧密联系，我几乎隔一天就要给总社写信，直到夜里11点左右。因为，上海、长崎间联络船是每两日一次，而东京、上海间的书信，一般要四天。联络船到上海是午后4点到5点左右，开往长崎，是第二天上午4点。因此，以普通的速度回信，要在两天以后的下次船发出。为了提前两天回信，只好把总社交联络船带来的信，在当天晚上读完，并立即写回信，在第二天早上开船之前将信送到船上。因此，每当联络船入港，就要上夜班。这样一来，在总社的人便谈论“上海的回信好像比从前快多啦！”由于我每次都是如此快速复信，因此，总社的有关人员，包括总务方面以及经济方面的人对于上海的请示信，也都尽快复信。

在财务上，我严格地限制分社的财务开支，结果，不论是每季度末的决算，还是年终决算，当把分社的收支报告提交给总社时，数额总是基本与预算一致。这使总社的经营部感到震惊。因为，经营部的人虽对海外分社规定了预算，但其意在于提示大体上的支出总额的预测，海外分社社长如认为为了采访有必要支出时，也可不受预算限制。我不知道预算是如此宽松，因而一直贯彻了严格执行预算的思想。因此，经营部长渐渐信赖我们了。这样一来，即使向总社申请预算外的特殊支出，如果要求合理，总社也就予以应允，分社的工作变得容易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执行古野先生关于把分社的车子处理掉的命令。从到任之日起，每天平均驱车二、三十英里，而内外的各特派员也要乘车，与外国人间的应酬，邀请别人、或被别人邀请，也多在夜间，因此，痛感车子绝对需要。

安装非法无线电台

向东京总社拍发电讯，主要靠“联合”私设的两台1000瓦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非法的。但因设在日本租界内，中国的警察出